

香港。上海 兩生花

書名：城牆——晚清民國 十六城記

著者：張泉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定價：108港元



老香港 網上圖片



一八六四年，大英輪船公司的蘇格蘭職員蘇石蘭(Thomas Sutherland)在「馬尼拉」號的漫長旅途中，百無聊賴地信手翻起幾本散落的《布萊克伍德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這本雜誌以成名的恐怖小說和時評都沒有吸引蘇石蘭，反倒是幾篇有關銀行業務的文章，引起了這個金融外行的興趣。一個狂熱的計劃在他心中醞釀，他發覺：「如果機會合適，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據蘇格蘭原則在中國開設一家銀行」。 (注1) 這朦朧的念頭在幾個月後卻分曉出兩條生命，當蘇石蘭把它寫進匯豐銀行計劃書時，它已經變成「匯豐銀行將在香港和上海同時開業。而且由於它在上海的業務最為重要，因此擬在上海設立一個當地的董事會，以便更有效地進行工作。」

小城崛起

蘇石蘭在一八五〇年代才第一次到達香港，他見到的香港正從初建的喧囂中沉靜下來。

蘇石蘭沒能看到香港的創世神話——採石場的敲打聲經夜不絕，冒着熱氣的花崗岩成車地運往碼頭集結。石頭與金屬摩擦的火藥味灼燒着這片前途不明的海岸，人們在荒蕪中鋪出道路，面朝大海自西向東豎起建築。英國商人們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他們從客居多年的船艙裡探出頭，或者伸着懶腰走出向葡萄牙人借租的澳門小房子，滿懷躊躇地擁向香港。同時流入香港的還有來自大陸的中國勞工，每個季節過去，人口都在成倍激增，就像雷爾特在《中國》中敘述的那樣：「在自由的旗幟下，一條條街道突然出現，有如巫師的魔杖所招來。」一個繁忙的自由港業已巍然成形。

在中國人看來，香港崛起的速度顯然過於驚人了些，甚至有些不可理喻。在中國的歷史上，要建造一座舉世矚目的城市，動輒需要集合全國之力，進行長達數年的營造，需要預言家反覆的風水推戴，需要帝王頻繁而冗長的詔書，需要重臣們廢寢忘食、晝夜監督，需要招攬到天下手藝最為精湛的工匠們，濟濟一堂，夜以繼日地營建。一座城市的崛起，總是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香港似乎並沒有奉行這些繁文縟節，一紙條約簽訂之後，它就橫空出世了。

自從一八四一年六月七日義律(Charles Elliot)宣佈香港為自由港以來，這座曾經默默無聞的小城便迎來人口、財富、城市的井噴。隨着不斷湧入的各國商人、洋行、商舖、廠房，荒島上蜿蜒出最初的街道、樓宇格局。一年後，香港建成第一條柏油路，按照慣例，港英當局把這座新征服的城市的第一條道路獻給維多利亞女王，命名為Queen's Road。不料，華人師爺卻想當然地將「女王大道」譯為「皇后大道」，無論港英當局怎樣澄清，明令禁止，華人仍然固執地維持着這

個讓英國人哭笑不得的稱呼，香港人對英國的微妙態度，以這種溫吞離奇的方式流傳下去。

長江盡頭的銀元王國

到一八四五年，香港已經擁有三個輪渡碼頭，次年，長達三十九公里的環島路將這座荒島史無前例地融為一體，而電燈和下水道系統，也在這幾年間完成了最初的架構。

香港的發展看起來有條不紊，英國人卻仍然沒有改變對它的偏見。從馬夏爾尼使團訪華以來，英國人就不止一次坦言，他們更感興趣的

能產生的巨額花費，港英當局下不了決心，商人們更沒有信心。他們不知道自己會在香港逗留多久，付出這樣昂貴的代價是否值得。這次遲遲導致多年以後，港英當局不得不花費數倍的代價持續地對香港的城市格局修補補。

在英國人魂牽夢縈的舟山附近，也確實有一座新城正在悄然萌芽。長江盡頭的上海，與珠江盡頭的香港不同，擁擠的九門之內根本無處安插洋人的房屋與教堂，他們只能沿着蘆葦叢搭起簡易的小屋。這個縣城依然固執而保守，被強大的傳統頑固地盤踞着。麥肯齊(C. Mackenzie)把上海稱為銀元王國(Realms of Silver)，因為「上海的中國人不像香港的中國人那樣，他們對鈔票不大理會」。這座城市看起來完全不具備現代金融的土壤。不過，它的航運已經初具規模，姑蘇的富豪宅第、湖州的魚米畫舫，都已經在它面前黯然失色，甚至，連以轉口港貿易著稱的香港，也開始感受到它的威脅。各國的商人們總是希望能距中國市場的腹地更近一些，在這一帶上，香港依然無法與上海匹敵，商人的判斷與英國政府一向的態度幾乎是一致的。如果不是因為太平天國與清廷在東南沿海漫長的戰禍相對減緩了上海的貿易發展，香港的前途，或許仍未可知。

這兩座城市，於是從創生伊始就面對着彼此糾葛的命運。它們同樣從璞石中脫穎而出，被雕琢成碧玉；它們擁有相似的氣質、相似的自然環境和地理優勢，也被賦予相似的期待。蘇石蘭選定的，正是這兩座宛如雙生的城市。按照當時以業務地區來為銀行取名的慣例，他規劃中的這家銀行被命名為「香港上海銀行」。它的中文譯名「匯豐」的來由，同樣不算高明，取「匯款豐富」之意。

注：

- 根據蘇石蘭一九〇九年匯豐年宴上的講話。劉詩平著：《匯豐金融帝國：140年的中國故事》，中國方正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九頁。
- 根據姚啟勳著：《香港金融》，一九三一年，第三頁。

本文篇名及小標題為編輯添加。



1860年代的香港 網上圖片

是具有絕佳戰略位置和商貿意義的舟山。與舟山相比，帝國邊緣的香港，至多只是進駐廣州的一個跳板，而荒蠻的山地，瀟灑的瘴氣，更令英國人望而生畏。直到一八四四年，香港政府會計官馬丁(M. Martin)仍然試圖勸說英國放棄香港，他的條陳被總督約翰·戴維斯(John F. Davis)拒絕，戴維斯篤信，只要經過長時間的經營，天時與地利上的一切劣勢，都可以彌補、克服。(注2)

因為這種猶疑的心態，香港錯過了全面規劃的良機。一八四三年，英國人哥頓(Gordon)針對整個香港島的地理分佈，設計出一整套營造計劃，在他的規劃中，不僅要對行政區、商業區和住宅區進行合理的區隔，更要通過填海、修建環島公路和開鑿運河，將整個島嶼連為一體。哥頓的計劃看起來很有誘惑力，卻終究還是被迫擱淺。面對可

巴金百年

在當代華人學者中，我也算是應邀到世界各地演講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請者，不向國內報道。原因，就不說了。

在邀請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應，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說了。

但是，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被例接受邀請，在外灘的上海檔案館演講。原因是，八天後，正是巴金百歲壽辰。

慶祝百年大壽，本該有一個隆重的儀式，親友如雲，讀者如潮，高官紛至，禮敬有加。這樣做，雖也完全應該，卻總免不了騷擾住在醫院裡那位特別樸素又特別喜歡安靜的老人。不知是誰出的主意，只讓幾個文人在黃浦江邊花幾天時間細細地談老人。而且，是在檔案館，似乎在提醒這座已經不太明白文化是甚麼的城市，至少有一種文化，與江邊這些不受海風侵蝕的花崗岩有關，與百年沉澱有關。

由我開場。在我之後，作家冰心的女兒吳青、巴金的孫子李致、巴金的研究

者陳思和，都是很好的學者，會連着一天天講下去。講完，就是壽辰了。

沒想到來的聽眾那麼多，而且來了都那麼安靜，連走路、落座都輕手輕腳。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人，下一輩、再下一輩，包括他經常寫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與他們都熟，投去一個微笑，他們也都朝我輕輕點了點頭。有他們在，我就知道該用甚麼語調開口了。

家人對老人，容易「熟視無睹」。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給世界帶來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開口就說，請大家凝神屏息，對巴金的百歲高齡再添一份神聖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於下面這些年齡排列——

- 中國古代一流文學家的年齡：
活到四十多歲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歲的，有司馬遷、韓愈；
活到六十多歲的多了，有屈原、陶淵明、李白、蘇軾、辛棄疾；



余秋雨 《何謂文化》
作者：余秋雨
出版：中和出版
定價：98港元



文：余秋雨

節選自《何謂文化》

活到七十多歲的不多，有蒲松齡、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歲，現在想起來的，只有陸游。

擴大視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歲的第一流文學家，有但丁、巴爾扎克、莎士比亞、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歲的，有薄伽丘、塞萬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歲的，有小仲馬、馬克·吐溫、薩特、川端康成、羅曼·羅蘭；
活到八十多歲的，有歌德、雨果、托爾斯泰、泰戈爾；
活到九十多歲的，有蕭伯納。

在中外第一流文學家之後，我又縮小範圍，拉近時間，對於中國現代作家的年齡也作了一個統計。

活到七十多歲的，有張愛玲、張恨水；
活到八十多歲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從文、林語堂；
活到九十多歲的，有葉聖陶、夏衍、冰心。

我的記憶可能有誤，沒時間一一核對

了。但在演講現場，我把這麼多名字挨個兒一說，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莊嚴起來。

這個名單裡沒有巴金，但巴金卻是終點。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轉過身來，一起都注視着這個中國老人。至少到我演講的這一刻，他是第一名。

傑出作家的長壽，與別人的長壽不一樣。他們讓逝去的時間留駐，讓枯萎的時間返綠，讓冷卻的時間轉暖。一個重要作家的離去，是一種已經泛化了的社會目光的關閉，也是一種已經被習慣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斷，這種失落不可挽回。我們不妨大膽設想一下：如果能讓司馬遷看到漢朝的崩潰，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魯迅看到「文革」，將會產生多麼大的思維碰撞！他們的反應，大家無法揣測，但他們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個世紀。這一個世紀的中國，發生多少讓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能不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們深陷困惑的時候，突然會想起還有一些目光和頭腦與自己同時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